

# 中美建交與東亞新安全 秩序的緣起

牛軍

197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安全秩序轉折之年，中美建交是標誌性事件。二戰後的東亞秩序大致緣起1948年，與冷戰爆發高度重疊。此後三十年間，東亞地區的對抗與大規模戰爭不斷，包括朝鮮戰爭、兩次越南戰爭，以及一些國家內部的大規模戰爭與衝突，等等。直到1979年第一天，中美宣布正式建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隨後於1月28日至2月5日訪美，8日回到北京。九天後中國軍隊發動了對越作戰，至3月16日基本結束。從此以後四十多年，東亞維持了基本穩定與和平，以及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繁榮。簡單比較東亞地區前後兩個歷史階段的基本情況，可以明瞭中美建交之於東亞秩序重塑的特殊重要性；本文也提出一個歷史問題：中美從1972年和解到1979年建交的六年多時間裏，是否就重塑東亞秩序達成過某種程度的共識？這種共識如果存在的話，是否影響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將敘述和分析這一階段中美地緣戰略合作是如何興起與演變的。

## 一 戰略合作的開啟與發展

1972年2月21至28日，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在中國進行了他稱之為「改變世界的七天」的訪問。此次訪問後中美發表了史上第一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其中「達成共識」部分的第三款明確宣布：「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史稱「反霸」條款相當明確地將中美戰略合作的領域指向東亞的地緣政治，不過雙方對「霸權」的含義和涉及東亞的具體內容的

解釋有同有異：所謂「同」是雙方都反對蘇聯在亞太擴張，具體包括反對蘇聯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和相關軍事行動。「異」則主要反映在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干涉，將其斥為霸權主義行徑，雖然在《上海公報》中沒有這樣的文字；美方一方面表示將從印支撤出全部美軍，另一方面提出應接受越南共和國（南越）的八項條件（包括美軍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交換戰俘、所有外國軍隊撤出印支半島、南越重新舉行大選等），可見美國撤軍還是有條件的。

關於朝鮮半島，雙方各自表達了支持北南某一方，不過具體闡述有重合之處，包括中國表示支持北方的和平統一政策，美國則表示維護南方的安全。這種情況多少與多年前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有關。關於日本，中國表示堅決反對其復活軍國主義，美國則表達將高度珍視美日友好關係，等等。

可以說，《上海公報》既是中美在東亞地緣政治領域合作的開端，也揭示了存在的各種分歧。這些分歧中，有的隨着時間推移解決了。例如，由於中日在尼克松訪華後很快建交，中國隨之改變了對日政策。再如對於朝鮮半島政策，雙方都表達各自支持一方的立場，同時也都主張維持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有的分歧則變得複雜化，例如在印支地區，《上海公報》發表時雙方的分歧主要是美國是否和何時撤出全部美軍。

1973年伊始，國際形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首先是尼克松競選連任成功；其次是1月底，美國與越南在巴黎談判並達成協議，美軍將根據協議全部撤出印支。隨着越南問題的解決和印支形勢的演變，中美在印支的地緣政治鬥爭基本結束，這為戰略合作帶來重要機遇，中美相關政策出現了新的共同點，雙方最初的努力也是有成效的，只是重點從東亞轉移到了全球（下詳）。

尼克松在1972年2月首次訪華期間，曾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談中很明確地說：「我的目標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如果我可以贏得大選，就有五年的時間去實現。」他在1973年1月第二任期伊始即致信周恩來，表達將加強兩國關係和安排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盡早訪華，以及希望中方在巴黎美越和談的關鍵時刻給予助力。6日，周恩來回函表示祝賀，並稱基辛格在巴黎和談結束後即可來北京訪問。尼克松顯然有意履行第二任期實現中美建交的承諾，並希望能再次訪華以完成使命。

2月15日，基辛格到達北京。他首先與周恩來舉行了三次會談，其間重申尼克松新任期內將遵守《上海公報》的共識，並提出分階段實現關係正常化，第一步先於1973年5月開始在兩國首都分別設立規格相當於大使館的聯絡處，這方面雙方很快達成一致。不過在戰略合作問題上，周恩來提出了基辛格似乎沒料到的疑問。尼克松在前一年5月訪華後不久訪問莫斯科，美蘇達成了第一階段戰略武器協議，中方曾對此表達過擔心和反感。這次周恩來直接提出西方是否存在「禍水東引」的企圖，即在美蘇關係「緩和」時，將蘇聯擴張的矛頭引向中國；他說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在爭霸」，但蘇聯的「欺騙性更



牛軍教授(資料圖片)

大、危險性更大」。基辛格則一再解釋說，至少尼克松政府絕無此意。但此話題並未到此為止。

2月17日晚，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由於美越簽訂和平協議，這意味着美國對中國南方的軍事威脅終於消失。另一方面，中國對外關係正快速擴展。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構思出了一個異常宏大的、稱之為「一條線」的大戰略。他對基辛格說，簡言之就是「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目的是反對蘇聯擴張。這表明中國仍將蘇聯視為最緊迫的安全威脅，而美國則是反蘇國際統一戰線中的重要成員。這正是美國所樂見的，所以基辛格對此讚賞不已。毛澤東還說，既然尼克松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上還沒下決心，中國還可以等，而他現在更關切的是美國「總是有套政策，譬如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你們壓迫德國和俄國宣戰」；一旦蘇聯入侵中國，美國和歐洲恐怕「都會認為禍水流向中國將是一件好事」，總之中國「必須作最壞的考慮」。基辛格其間幾次插話說美國絕無此類坐收漁利之想法，如蘇聯攻擊中國，美國肯定「反對他們」。

需要指出的是，當毛澤東說中國針對蘇聯進攻將還以「游擊戰和持久戰」時，基辛格提到，如蘇聯不派軍隊，只進行核打擊呢？毛澤東當時回覆說：「也許你們可以組成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問題。」在第二天的會談中，周恩來向基辛格解釋了毛澤東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構想，以及中國「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來防止蘇聯突然襲擊。他提醒基辛格注意：「毛主

席要求你組織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在此不厭其詳地引述毛澤東和周恩來談話中的這個內容，是因為其影響了隨後的中美戰略對話。

此次基辛格訪華的成果是，雙方達成了分兩階段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共識。3月12日，尼克松告訴基辛格，希望周恩來能有機會訪問華盛頓。他還分別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一定在此任期內完成建交。他設想再次訪華時能完成建交，在此之前周恩來訪美是必要的。5月1日，中美分別在華盛頓和北京設立聯絡處。兩周後，基辛格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副主任韓旭，向周恩來發出訪問華盛頓的邀請，沒想到很快被拒絕了。

6月16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 (Leonid I. Brezhnev) 到達華盛頓，開始為期九天的訪問，其間美蘇達成多項協議。19日，基辛格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通報美蘇峰會情況，重申將與中國共同反對霸權，並轉交一封尼克松給周恩來的信。黃鎮當時告訴基辛格，周恩來近期還不打算出國。當天，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 (David K. E. Bruce) 緊急約見中國外交部負責人，面交尼克松信件的副本，並提出會見周恩來。兩天後，周恩來報請毛澤東批准，後者於24日允准，並要翻譯王海容轉告周恩來：「與資聯合常忌鬥爭。」這或許不是空穴來風。

6月25日，周恩來會見布魯斯，強烈表達非常懷疑美蘇想要主宰世界，而中國將拭目以待。他還提到毛澤東在1972年就說過，「你們是踩着中國肩膀跳到莫斯科」；如中蘇爆發戰爭，美國會「坐山觀虎鬥」，「拖一段時間，再從後面打蘇聯」。他最後說，美國「說許多空話，不如做一件實事」。毛澤東第二天看到會談記錄後令人轉告周恩來：「這下腰桿子硬了。」

從尼克松1972年2月訪華到此時為止，美蘇領導人已實現互訪，並陸續達成多項戰略武器協議和改善雙邊關係協議。反觀中美關係則進展有限，特別是毛澤東不久前才向基辛格闡述了他的「一條線」大戰略，美國人反而先同勃列日涅夫簽訂了一堆協議。所以，周恩來告訴布魯斯「說許多空話，不如做一件實事」，是很有針對性的。關鍵是基辛格如何理解周恩來說的「一件實事」指的是甚麼，或者他認為美國這時能做甚麼。

7月6日，基辛格約見黃鎮，試圖挽回美蘇峰會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他專門解釋了美蘇峰會的情況，還承諾一旦蘇聯進攻中國，美國絕不會袖手旁觀，首先會立即實施經濟制裁；其次他打算馬上就成立一個由四五名優秀的美國退役將軍組成的小組，「看看美國還能做些甚麼」，而他在訪華時會討論這件事。這個構想是對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他時相關提議的回應。他還再次邀請周恩來訪美，並解釋說尼克松第二任期內想再次訪華，此前需要有中國領導人來華盛頓一次。黃鎮回覆說，建交前周恩來不會訪美。中方隨後還推遲了基辛格原定的8月6日訪華行程。這與中國外交系統的情況有關：

6月28日，在周恩來會見布魯斯的三天後，外交部編印的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刊登一篇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基本看法〉的文章，

其中提出美蘇峰會證明了「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毛澤東在7月1日讀到該文後非常生氣，並令人向外交部傳達他的不滿。4日，他又專門約王洪文、張春橋談話，先是批評外交系統「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並警告說「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毛澤東批評外交部的談話還直接聯繫到批判儒家，的確耐人尋味。第二天，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專門作了檢討，外交部隨後承認，「對形勢的看法是右的」，今後將「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

11月10至14日，基辛格再度訪華。他離開北京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公報〉，其中有一段「雙方一致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特別重要的是，在具有權威的級別上保持經常接觸，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並在不代表第三方談判的情況下進行具體磋商」。如果說基辛格2月訪華將中美關係正常化向前推動了一步，那麼這次訪華的收穫是使雙方的戰略合作更進一步，所以基辛格一直對此行評價甚高。但他當時沒有料到，中美戰略對話就此止步了。

基辛格訪華期間，11月12日下午，毛澤東與他會談近三個小時，內容涉及廣泛。毛澤東首先表示美國國內正發酵的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沒甚麼大不了的」，意即美國國內政治不影響中方繼續與尼克松政府合作；然後重點轉到全球形勢和台灣問題。基辛格照例強調對中國坦誠相見，而蘇聯人「讓外界以為美蘇有共同統治世界的偉大計劃」，這是欺騙。毛澤東對此表示認可，還說蘇聯可能進攻中國；基辛格立刻聲稱，「我過去以為，這在理論是可能的，現在我認為，有更大的現實可能性……他們〔蘇聯〕特別要摧毀你們的核能力」。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基辛格重申了尼克松打算在1976年或之前與中國建交，毛澤東表示「可以嘛」，「你們現在還需要台灣」，而中國還可以等，解決方式就是「日本模式」（「只要你們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我們兩國就可能解決外交關係問題，就是說，像日本那樣」），總之「整個國際問題是重要問題」。美方記錄中說會談氣氛還算融洽。官修《毛澤東傳》描述說，基辛格在台灣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使毛澤東多少感到不快」。此說依據為何待考。

訪華期間，基辛格還與周恩來有數次會談，內容涉及全球和雙邊關係。在最後的會談中，基辛格建議雙方建立專門的軍事聯絡機制（包括熱線），以協助中國對蘇聯核攻擊的早期預警。綜合中方間接披露的內容和美方公布的部分記錄（包括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和尼克松總統圖書館[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檔案），周恩來先是重複了毛澤東所謂「作最壞情況的準備」，準備獨立應付來自「幾個方面同時向我們進攻」；然後對基辛格的合作建議給予了正面回應，說他本人和葉劍英將負責此事，當然能否實現必須「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基辛格提出這類建議或

許是為了加強軍事合作，或許是為了打消中國領導人對美蘇「緩和」後果的疑慮。他肯定沒想到這引發了毛澤東的強烈反應。

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有關成員開會，說他同基辛格談的「意思是……北極熊〔蘇聯〕要咬你們，要向西，到歐洲、中東和美國」，而不是「整中國」。之後他再提「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我看不跟它搞甚麼軍事同盟那一套」，而且現在貿易都搞多了。他甚至對經他和全體在京政治局委員都圈閱同意的中美〈公報〉都表示了不滿。毛澤東並未點名，但周恩來立即檢討自己「做得不夠」。事情並未到此為止，政治局從21日起到12月上旬，數次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他們甚至一度被栽上「右傾投降主義」。會議持續到12月上旬結束，而有關對外政策的批判遠未停止，一直延續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且愈演愈烈。

對照美方記錄和中方官修傳記、年譜等披露的關於中美會談的內容，並沒有上述毛澤東在11月17日開會時所說諸如蘇聯的戰略矛頭指向歐美而非中國等話語，而且他對基辛格在會談中所提蘇聯企圖打擊中國核設施，並非完全不為所動。毛澤東這次發起批判周恩來，更像是文化大革命運動邏輯的延續，具體原因並不是（或主要不是）對美政策的分歧，但結果就是周恩來從此不再參與中美戰略對話。基辛格多年後回憶說，1973年11月訪華後，他見到的中國官員中再沒人提到周恩來。1974年11月25日，他訪華期間曾到醫院看望罹患癌症的周恩來。會見約二十幾分鐘，其間周恩來以遵醫囑為由避談政治、外交。基辛格說：「這象徵中美對話與周恩來的關係宣告結束。」

## 二 停滯的戰略對話

自1974年起，中美兩國內政同時出現動盪。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裏，中國國內政治成為中美關係正常化處於「冰凍」狀態的主要原因。這期間中國最重要的變化莫過於鄧小平取代周恩來接管了中美對話，這使他能夠充分和準確地了解中美關係的進展、重點與癥結。在全球層面，毛澤東堅持貫徹其所謂「一條線」戰略。鄧小平對此不僅表示贊成，而且堅決執行。這一戰略是中美在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的環境中尚能夠維持高層對話的前提，也是每次對話的優先話題，不過僅此而已。

1974年4月15日，鄧小平在參加聯合國大會時，在紐約第一次與基辛格會談。這次會談最有意義的成果是雙方立刻達成共識，都不會因為中美各自的內政問題——美國的水門事件和中國的批林批孔——影響戰略對話。會談中鄧小平表示對水門事件不感興趣；基辛格通過旁敲側擊，了解到周恩來處境微妙，但他表示相信中國的政策會保持一致性。基辛格在會談中再提他去年11月向周恩來建議的建立軍事合作機制，鄧小平則立即將話題岔開，由此

可見此話題相當敏感。戰略合作的其他領域的確乏善可陳，保持溝通的價值就在於維持了基本的戰略互信。

這期間，中國領導人一再表達對美國「緩和」政策的疑慮和指責，以及對越南戰爭後美國正在衰落的看法。這是毛澤東對世界政治的理解的延伸，也的確反映了中方對美國戰略意圖的深刻懷疑。美國領導人則有意地一再強調，與蘇「緩和」不是因為美國在衰落，而是基於實力，包括美國海軍、空軍、戰略核武器和導彈，以及戰略空軍等運輸能力方面，都具有對蘇聯的壓倒優勢；而且為了對抗蘇聯的擴張行動，美國幾乎在各方面都針鋒相對地採取了反制行動。但美國人的解釋難以獲得中方認可。

1975年10月下旬，基辛格為安排新任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R. Ford)訪華，再次到訪北京。20日，鄧小平會見到訪的基辛格時，雙方發生了措辭尖銳的爭論。鄧小平又一次批評美國在搞妥協，特別是企圖「禍水東引」，並引1938年的「慕尼黑事件」為例。基辛格立即予以激烈的反駁，說「你們在世界其他地區並沒有給我們幫助」；他在華盛頓任職以來，經歷了在中東和歐洲與蘇聯的四次衝突，美國「都是自行應對，並不知道其他國家包括中國，會如何處理」。他甚至隱晦地提到1939年斯大林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一事來反唇相譏，並說「當中方直接針對我們時，我們就非反對不可了」。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時坦承，中國對付蘇聯的辦法還是「小米加步槍」，但雙方爭論的實質不是用甚麼方式對付蘇聯，而是美國「踩着中國肩膀跳到莫斯科」，「你們〔美國〕已經跳到那裏〔蘇聯〕，但你們不再需要我們〔中國〕的肩膀」；基辛格立即予以否認。為替之前基辛格與鄧小平的爭論緩頰，毛澤東告訴基辛格，他很想邀請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盡早訪華，而且最好是隨即將訪華的福特一起前來。這是毛澤東想維持和推進中美戰略合作而邁出的一小步。當基辛格藉機又一次試探他倡導的軍事合作建議時，毛澤東明確予以拒絕，說「等到戰爭開打了再說」。顯然，中美戰略合作以此為界了。

之後不久，12月3日，鄧小平與到訪的福特會談。後者在2日剛見過毛澤東，當時鄧小平也在座。福特這次開始便說，美國在許多方面都已經和將繼續挑戰蘇聯，希望知道中國將在哪些地區(如東南亞、中東或非洲等)，以何種方式對付蘇聯的挑戰；如能告知，美國就知道如何配合了。鄧小平略顯緊張，說中國一是「做好自己的準備」；二是「發了幾次空炮」，如鼓勵日本、歐洲加強與美國的關係等。其實不論是鄧小平還是毛澤東，都沒有迴避中國實力、地位與美國的巨大落差，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中國「發了幾次空炮」。

這次對話應該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他後來下決心發起短促的對越戰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設想，如果中國的行動只限於宣布將用人民戰爭的方式自衛和喊喊口號，那麼建立乃至領導一個幾乎囊括全球的反蘇國際統一戰線將從何談起？不能對地緣政治產生實質影響的戰略設想都是空談，這是常識。

### 三 東亞戰略合作與中美建交

中美於1973年5月建立聯絡處後，雙邊關係問題一直蹉跎到1978年初都沒有進展。在美國，實質性的變化發生在1978年春，1977年卡特(James E. Carter)上任後，政府內部開始認真討論是否盡快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並終於下定決心，決定包括秘密談判方式、地點、談判者、建交時間表，等等。尤為關鍵的是，他們決定接受中國一直堅持的台灣問題「三條件」(廢約、撤軍、斷交)，同時將表達對「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關切」，以及中美建交後繼續根據情況售台武器兩點。在中國，經過毛澤東去世後的短暫動盪，鄧小平於1977年秋季重返中國政治舞台並大權在握，迅速參與並駕馭中美對話。

5月20至23日，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訪華。他此行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國領導人說明，卡特已決心實現雙方關係正常化。中方最初對布熱津斯基此行估計不足，認為卡特政府「尚未下決心，但又要保持接觸，以利對蘇施加影響」。布熱津斯基先後會見了外交部長黃華、副總理鄧小平和總理華國鋒等中國主要領導人，其中在21日與鄧小平的會談是關鍵環節。會談中他一再強調，卡特「已經下定決心了」，並希望建交進程「走得更快」；鄧小平說如此則「解決問題會更容易」。

會談後，鄧小平在北海仿膳飯莊設宴款待布熱津斯基，後者在宴席上向鄧小平發出訪美邀請，鄧小平欣然接受。至關重要的是，他們之間建立了必要的互信。鄧小平尤為欣賞布熱津斯基所言，中美合作是「基於長期的共同戰略利益，而不是策略的權宜之計」。後來他不時會闡述中國的對美政策也是如此。

值得重視的是，布熱津斯基通過與中國領導人對話，逐步形成了東亞地緣戰略的想像。他離開北京後順訪東京，按中國領導人的建議，說服日本接受「反霸」條款以完成與中國締結和平條約。布熱津斯基在北京與黃華的會談中曾告訴後者，美國反對越南建立印支聯邦。回到華盛頓後，他曾一再向卡特建議，如果後者還想要按計劃當年實現中美建交的話，在涉及印支問題時，不要使用「將實現美越關係正常化」這樣的提法，避免引起正與越南交惡的中方疑慮。10月13日，他在一份給卡特的備忘錄中說：「我們現在有機會創建一個新的穩定的遠東框架，它基於與日本、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密切合作，以及與中國日益加強的合作。」

鄧小平在與布熱津斯基會談中除了表示加強戰略合作外，也開始將正在醞釀的國家戰略轉變引入中美戰略對話。1978年春夏，在卡特政府討論和決定與中國就建交展開實質性談判的同時，中國領導層興起了一波出國考察潮。當時影響最直接的是，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於5月2日至6月5日考察了西歐五個國家，他們回國後撰寫了詳細的報告。中國領導人於7月召開國務院務虛會，討論如何學習外國的成功經驗，並基本確定了向西方開放的大方向。

中共中央決意將國家戰略轉向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是他們下決心加快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的關鍵動力。11月2日，中共領導人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並決定加快中美建交談判。他們將更多時間和主要精力用在推動國家戰略進行革命性的轉變上，鄧小平本人在直接參加建交談判之前，一直在參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式上發表了主題為「解放思想」的講話，宣布開始一場實現「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的「偉大的革命」。從當日晚上開始到15日，鄧小平與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F. Woodcock）舉行了四次會談。雙方最終決定，16日發表聯合公報，宣布翌年1月1日兩國建交。兩天後，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推動建交談判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中美地緣戰略合作終於進入到落實階段。與建交談判同時，中國決策層開始醞釀對越南的邊界戰爭。比照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的內容，變化最大的是印支問題。1973年美軍全部撤出越南後，一方面，蘇聯繼續把印支同美蘇全球對抗捆綁在一起；另一方面，中越之間原本被掩蓋着的矛盾凸顯出來。這些矛盾包括歷史和地緣因素帶來的摩擦、中蘇對抗造成的消極影響，以及中越在對美政策問題上的長期分歧，等等。

中國對外援助政策的轉變扯斷了維繫中越關係的最後一根紐帶。1975年3月19日，為了配合第五個五年計劃編制，副總理余秋里召集專門會議討論如何在宏觀上控制對外援助，並將討論結果專門匯報給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此後六個有關部委聯合上報〈關於今後對外援助工作問題的請示報告〉，並獲中共中央批准執行。該報告的核心內容簡單地說，就是宏觀控制，量力而行，尤其是下調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外援助中的佔比。8月，越南代表團訪華繼續尋求援助，但遠未能達成預期的目標。9月24日，毛澤東、鄧小平等在北京與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黎筍直接討論了雙方關係中的問題，結果也未能阻止中越關係的迅速下滑。

早在1976年6、7月間，解放軍總參謀部、外交部、公安部等在南寧召開過聯席會議，討論如何處理越軍在中越邊境地帶製造的各種糾紛，會後下發了〈關於正確處理中越邊境糾紛的指示〉，要求在邊境糾紛中必須保持克制，避免引發軍事衝突。儘管如此，中越邊境地區的糾紛仍然呈上升趨勢，衝突愈演愈烈。1977年6月10日，負責外事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向訪歐前途經北京的越南總理范文同詳細、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嚴重不滿，不僅涉及越南的反華宣傳，而且包括陸地和海洋的領土糾紛、越南華僑問題等。顯然，中國領導層已經形成中越雙邊關係全面惡化的判斷。

中國決策層開始考慮採取軍事行動是在1978年夏季。9月，總參召開有關部隊和部門的聯繫會議，討論日益加劇的中越緊張局勢，包括如何處理8月下旬越軍襲擊廣西邊境地區哨所，特別是懲罰越軍日益升高的挑釁。與會者均贊成實施軍事打擊，但對作戰規模的確有不同看法。部分人提出，要從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來考慮軍事行動，建議在更大的地域打擊越軍。

中越雙邊關係緊張是同越蘇結盟並在印支地區擴張結合在一起的，這是促使中國決策層愈來愈傾向於認為，只有採取軍事行動才能遏制越南地區擴張的重要原因。因此，反對越南擴張，特別是反對越南建立印支聯邦的計劃，也成為這一時期每次中美對話中必談的重要議題。

11月3日，越南與蘇聯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12月25日，越南軍隊攻佔柬埔寨，在金邊扶持了一個親越南的政權，後者很快同越南簽訂和平友好合作條約，與老撾簽署了合作協議，從而形成了一個越南主導的親蘇地區軍事集團。這種局面使中國領導人斷定，越南的擴張同蘇聯全球戰略有直接關係，「是蘇聯爭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部署的一個重大步驟」，尤其是蘇聯包圍中國的一環。所以他們一再告誡越方，中方「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能把中國的話當成耳旁風」。鄧小平在11月中旬訪問東南亞幾個國家時，一路呼籲抵制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張。特別是在訪問新加坡期間，他曾向總理李光耀直接表示，已經有必要採取行動，制止並懲罰越南仰仗蘇聯在印支搞軍事擴張。

當時越南也在積極尋求與美國建交，而卡特政府的既定方針是無條件建交，故在談判中非常堅持，越方不能提出戰爭賠償和經濟援助這樣的條件。越南在1978年9月間做出重大讓步，表示不要美國戰爭賠償和財政援助，也可與之建交。卡特本人曾提出同時分別與中國和越南建交的設想，美方還於10月與越南就具體問題展開談判。這引起中方的關注和警惕，並通過不同渠道向美方發出明確的警告。布熱津斯基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告訴卡特，美國不得不在越南和中國之間做二選一的決斷。卡特直到越蘇簽訂同盟條約後，才根本打消了腳踩兩隻船的念頭。顯然，中國為打擊蘇聯、反對越南在印支擴張的立場，對中美地緣戰略合作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中共政治局會議於11月2日決定加快中美建交談判後不久，中央軍委於11月下旬召開一周會議，討論對越作戰並命令中國軍隊開始向中越邊境地區大規模集結。12月8日，中央軍委下達命令，一個月後實施對越作戰。後因準備工作不足而推遲。

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抵達華盛頓，開始幾天的訪美之旅。當晚，他在參加布熱津斯基的家宴時即提出，希望同卡特在小範圍裏討論越南問題。卡特政府在鄧小平到訪前一直密切關注中越關係和評估中國的政策，包括中國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所以，美方很快表示同意。29日，鄧小平與卡特在白宮舉行小範圍會談，他明確告訴後者，越南的地區野心由來已久，必須給予教訓，否則它會變本加厲，而且這關係到遏制蘇聯的全球擴張。卡特說他不贊成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因為會引起國際輿論的不良反應。鄧小平告訴他不必太擔心，中國軍隊將像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那樣速戰速決。他在卡特舉行的招待宴會的發言中，特別強調了中美關係的戰略性質，即中美雙方和全球的利益「要求我們從國際形勢的全局，用長遠的戰略觀點來看待兩國關係」。

1月30日上午，卡特在會談中照着他本人根據幕僚建議起草的字條，逐字唸了一段話，強調了保持克制態度的重要性。布熱津斯基也向黃華表達了美

方的擔心。但鄧小平完全不為所動，而且他通過會談大致得出結論：美國不可能公開指責中國的軍事行動。實際情況甚至更好，他訪問期間同美方達成了建立情報分享機制的協議，美方將向中方通報蘇軍的部署，並表示希望在新疆地區建立針對蘇聯的中美聯合監聽站等。這類合作雖然不是直接針對越南，但實質性地提升了中美對抗蘇聯的戰略合作。

此外，鄧小平還利用各種公開場合直言不諱地告訴美國公眾，中國「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對越南如「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這些舉措對美國公眾輿論顯然是有影響的。卡特政府雖然繼續猶豫不決，但還是調整了姿態和語調，確定了在戰爭中同時要求中國從越南、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所謂「雙撤軍」方針，並採取措施防止蘇聯介入。中越戰爭開始後，美國的確如約採取了相應的外交和軍事行動。

鄧小平第一次會見卡特時就說過，中美現在沒必要結盟，但沒有同盟這種形式，並不妨礙雙方展開密切的戰略合作，共同對付蘇聯擴張。布熱津斯基則評論說，中美領導人的會談「甚至是盟國之間所特有的」，而且「加強兩國關係的基礎已經奠定了」。他這樣說並非空穴來風。

2月15日，中國決策層在北京開會，做出開戰的最後決定。鄧小平隨即通報美方，中國將對越南展開速戰速決式的軍事打擊，這將有利於地區和全球和平。中國開戰後，卡特政府向蘇聯發出了反對軍事介入的明確信息，包括在東南亞進行軍事調動，以及第七艦隊在菲律賓附近海域進行軍事演習。鄧小平在訪美後談過，美國「官方語言打官腔，同私下講的不同」；「在朝同在野的人不同，相當的人很贊成我們的行動，就是官方也不是很反對」，而且美國還提供了有關蘇軍部署的戰略情報。中美戰略合作從中國對越作戰開始具有了實質性的內容，中國對外戰略的基本布局也因此固定下來。

## 四 小結

以上略顯瑣細的敘述是為了清楚展示中美建交談判與中國對越作戰決策是有關聯的。這場戰爭不論其具體動機為何，結果是兌現了中美建交所包含的地緣戰略共識。正是中美在東亞的戰略合作導致這個地區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蘇聯勢力不僅被擠出印支，而且逐步被相當徹底地趕出東亞地區。地緣戰略結構的改變正值東亞地區經濟起飛之際，中美戰略合作徹底杜絕了蘇聯模式在東亞擴展的可能，並為整個地區（除朝鮮外）的市場經濟改革和持續增長與繁榮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穩定與和平，使東亞地區得以整體性地進入世界體系，並終於成為今天與北美、歐洲鼎足而立的第三個世界中心。

**牛 軍**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榮退）。